

丁未政潮余波：岑春煊谋求复出与各方因应*

张建斌

摘要 光绪三十三年发生的丁未政潮，权臣岑春煊被排挤出局，积极谋求更为权势之地，遭到朝中各势力的暗中阻挠，可视为政潮余波。湖南巡抚岑春蓂提出选取廉明刚正大员巡阅长江，实为乃兄插手沿江事务发声，引起督抚端方、张之洞的不满，提议被否定，此后被暗中弹劾。南北洋联合打压岑春煊波及甚广，岑党要员沈瑜庆亦受牵连，御史台谏充当了斗争的工具。江督端方持续针对岑春煊的根源在于其覬覦已位，对于盘踞在沪的竞争对手格外关注，自然不能容忍政敌制造复出的舆论及种种谋划，晚清报刊介入政治于此体现尤为明显。岑春煊谋求复出过程反映了光宣之际的权力格局演变与政治生态变迁。

关键词 岑春煊；端方；袁世凯；张之洞；丁未政潮

中图分类号 K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23)07-0030-10

清末时人有言“京外总督三个半”，“三”指的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两广总督岑春煊，“半”为两江总督端方，可见四人在地方督抚中具有很高的声望。陈寅恪评价清季士大夫有清浊之分，将岑春煊、军机大臣瞿鸿禨等人视为清流，浊流的代表则是军机大臣奕劻及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众人。在日益变化的政局中，这些权臣因缘际会，芥蒂日深，相互倾轧，终在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集中爆发。奕劻、袁世凯、端方联合将瞿鸿禨、岑春煊排挤出局，时称丁未政潮。慈禧太后借此调整平衡朝局，但清廷高层内部的政争并未就此结束，反而致使疆臣权贵结下了更深的诟怨，岑春煊的去向尤为外界关注，成为政局演变最难确定的环节。

岑春煊寄居沪杭，表面上寄情山水，享受闲适之乐，又聘请西医治病，向外散布归隐的烟雾，实则时刻关注政局走向，多方着手谋求更具权势之地，但谈何容易。丁未政潮后统治集团已经调整形成的中央与地方格局，势必因性格刚直的“官屠”岑春煊的介入有所更动，而以奕劻、袁世凯、端方为首的政敌更不能容忍其轻易启用，占据要职，暗中作梗阻拦，可视为政潮余波。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案中存有多封密电，记述岑春煊谋求复出与各方的因应举措，这些材料还未见学人利用，借此可以揭示更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与内幕，对于加深光宣政局研究以及官场政治生态认知不无裨益^①。

一 岑氏昆仲谋求巡阅长江与张之洞阻挠

岑春煊被排挤出京后，不满于清廷任命的两广总督一职，寄居沪上谋求形胜之地。光绪三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革命党人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案发后，军机处致电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端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重大项目“‘中国之治’的历史根源及思想理念研究（22VLS006）”。

① 相关研究参见郭卫东：《论岑春煊》，《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2期，第52~73页；桑兵：《庚子勤王前后的岑春煊与保皇会》，《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6期，第55~80页；王惠荣：《从丁未政潮到洪宪败亡——岑春煊与护国战争》，《历史档案》2011年第3期，第105~113页。关于丙午官制改革至丁未政潮期间岑春煊与北洋集团的诟怨，参见郭卫东：《论丁未政潮》，《近代史研究》1989年第5期，第77~92页；张建斌：《端方与“丁未政潮”》，《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3期，第92~106页；韩策：《清季江督之争与丁未政潮的一个新解释》，《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4期，第55~69页。检讨过往研究，自丁未年岑离京至保路运动再度复出，在此三年期间岑氏与政局的举措，囿于史料，学界鲜有关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端方档案是本文重点依据的史料，为文章立论基础，学界目前利用较少。该档有八万余件，主要记录端方为官期间的往来电报、信函及各类杂务，涉及晚清重要史事，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方等沿江各省督抚严密防范,妥为布置,任命端方为筹议长江巡缉章程的牵线人,会商长江水师提督程文炳,江北提督荫昌,湖广总督张之洞,江西巡抚瑞良、湖南巡抚岑春蓂、江苏巡抚陈夔龙、安徽巡抚冯煦等沿江督抚要员,妥议巡缉章程,将文稿发送给中枢和疆臣讨论^①。

岑春蓂的有关提议引起性格狡黠的端方警觉。岑曾得到端方提携,二人原有着很好的交际。光绪二十九年,湖北布政使瞿廷韶因病出缺,署理湖广总督端方奏陈岑春蓂简放署理。光绪三十一年,由端方“与政府诸公切商之”,岑由偏僻无关大局的黔抚转湘抚^②。端方与岑春蓂渐生嫌隙则是清末政局演变的结果,与岑春煊有着密切关联,“文本(岑春煊)素有刚正之名,与鄙人(端方)貌合情离”。“貌合情离”,但尚不至于互相攻讦^③。随着丁未年春岑春煊入京弹劾北洋一系,并觊觎江督一职,后袁世凯告知端方,岑有此想法,但办不到,端方才稍安心,这也导致了端方与岑氏昆仲彻底决裂^④。岑春煊入京第一日,端方即给在京兄弟端绪去电,称“岑三近日与兄意见益深,到京后如何举动,务须设法侦探,逐日电告,不可稍涉轻忽”^⑤。基于此,岑春蓂的一些建言,不能不引起端方狐疑。

岑春蓂提出现任程文炳在任有年,于汛地缉匪捕盗事务样样不通,捕获著匪的成绩也不突出,在其所管辖的湖南沿江一带,长江水师无所作为,抢劫案迭出,看来非奏请另简廉明刚正大员,不足以资振作而收实效。他引同治年间彭玉麟巡阅长江案例,提议设立职位高于水师提督的长江巡阅使,看似讨论长江巡缉,但在政敌看来有为初衷是为其兄岑春煊谋得此职的嫌疑^⑥。此间端方正密布眼线,罗织岑春煊结交康梁的“证据”^⑦,可想而知,岑春蓂推荐刚直大员巡阅长江,插手沿江防务,对主管南洋事务的端方而言是不能接受的。

即便背靠奕劻与北洋,端方阻止岑春煊插手长江事务也并非易事,办成此事如得到张之洞的支持,则无疑大大增加了胜利的筹码。但端方虽在湖广任职有年,却与重臣张之洞并不交心,不能商议敏感之事。加之此次皖案发生,沿江各省会议长江巡缉章程由端方领衔,令盘踞湖广多年自认为南部督抚翘楚的张之洞颇为不快,在巡缉章程上做文章,有意与端方为难。端方一时摸不清张、岑底细,不敢贸然行动,因此而想到了极为投契的湖北按察使梁鼎芬^⑧。

梁鼎芬深得张之洞倚重,有“小张之洞”之誉,入幕多年,私下却与端方交谊。端方将岑春蓂的建言告知了梁鼎芬,称此论看似正大,实则不过欲为乃兄岑春煊组成巡视长江之事。在端方看来,“此事关系全局”,岑“耽之此席为日□久,若令得志,长江五千里安能复有宁日。且某意存叵测,假此重柄,似亦非宜”,希望梁劝张之洞介入,不要游移,“务请将利害得失痛切沥陈”,但嘱其“不可露出鄙意”^⑨。需要说明的是,岑春蓂此前也将长江巡阅使提议发给了张之洞,这反而便利了梁鼎芬运作此事,避免

① 有关皖案与清廷调整长江防务的相关研究,参见安东强、姜帆:《丁未皖案与清末政局》,《历史研究》2017年第4期,第79~94页。该文注重清廷中央与地方案发后的政策调整,其中的人事纠葛并非关注重点。

② 《张之洞致端方电》(光绪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本文所引档案,如非特别标注,均出自该处,下文不再一一标注),端方档案,档号:27-01-002-000131-0028。

③ 《端方致梁鼎芬电》(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初三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03-0010。

④ 端方听说岑春煊在京“极力运动求与鄙人互易”,向袁世凯打探消息,袁判断,“互易运动自在意中”,“想亦办不到”[《端方致袁世凯电》(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57-0023]。按,该电文原无时间,由四月二十一日袁世凯致端方电及文内“驾”电推断[《袁世凯致端方电》(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一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2-000252-0005]。

⑤ 《端方致端绪电》(光绪三十三年三月十七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60-0017。

⑥ 《岑春蓂致端方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2-000143-0080;《长沙岑抚台来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十九、二十日),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辑第110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4年版,第416页。

⑦ 关于端方丁未政潮期间对岑春煊的倾陷,参见张建斌:《端方与“丁未政潮”》,《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3期,第92~106页。

⑧ 端方与张之洞交际内情复杂,随着政局的演变分歧渐多,致使端方倒向北洋集团,对此,笔者有专文论述,在此不一一赘述。相关研究认为端方任湖北巡抚期间,与张、梁交谊深厚,相处融洽(参见陆德富:《张之洞致端方信札六通考释》,《文献》2017年第6期,第100~105页)。

⑨ 《端方致梁鼎芬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一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24-0122。

转述端方电文引起疑惑。经梁鼎芬从中斡旋,以张之洞名义否定了岑春煊的提议。张之洞回电称“陈义甚高,规模宏远”,但巡缉大员难选,“当世廉明刚正之大员实亦罕觐”,指出此前李秉衡巡阅长江号令诸将,张皇战守,“前车不远,思之可为寒心。今日长江幸无大事,似只可相题行文,不宜作谢眺惊人之句”^①。此电应是出于梁鼎芬手笔^②。

张之洞并未意识到端方暗中运作,致电征求意见,称“谕旨是令各省协助长江提督,非令撤换长江提督,此似是题外文章矣,尊处如何答复,祈速示”^③。对端方而言,乐见张氏所言,表示认同,“廉明刚正大员一时难得其选,中堂所虑正与鄙见相同”,同时将复电发给了岑春煊,以表明附张之意,不致开罪岑氏昆仲^④。端方狐假虎威,婉转借助张之洞之手阻止了政敌上位。再观岑春煊知己意不被采纳,复电称:“因人论事,始存其说,至如何妥议巡缉章程,夙仰荩画周详,原无事旁参未议。”^⑤无奈作罢。岑春煊“为政尚猛……遇事辄持己见,倔强不为人所屈”,学养未足、气质近粗,怀有抱负,张、端不愿其插手沿江事务,唯恐于己不利^⑥。

经端方暗中运作,长江水师提督依然由北洋集团程文炳担任。至七月初二日,岑春煊被罢官。十天后,端方致电袁世凯,告知一月前发生的岑氏兄弟谋求长江巡阅使一事,称岑春煊建议另举廉明大员坐制数省,“意在运动南皮为乃兄推毂”,“伊(岑春煊)命意于长江,终不能恝然,尚望公预为备虑为幸”。此时岑春煊已去职,端方旧事重提,无非是为了提醒袁世凯“伊虽开缺,久住沪上,必不安静”,需继续提防,岑春煊也在打击之列^⑦。

二 弹劾岑春煊的台前幕后

湖南巡抚岑春煊的进用虽受惠于端方提携举荐,但在日益变化的政局之中,端方与岑氏昆仲由广西边患期间的帮扶,逐渐演变成政敌。岑春煊为其兄谋划长江巡阅不成,势必还会继续奔走,端、袁诸人去“小西林”提上日程。

光绪丁未政潮期间,御史充当了权力斗争的工具,轮番发难是一大特点,先有赵启霖弹劾庆王父子,后有北洋集团授意恽毓鼎上奏一搏。借助言路与清议为政争常用伎俩。赵启霖因弹劾载振去职,回到原籍湖南,给了身为湘抚岑春煊联合的机会,为乃兄复仇,谋求复出^⑧。以敢言著称的赵启霖与岑联合自然引起端方格外关注,端方将此事告知亲信蔡乃煌,称岑氏兄弟暗中勾连台谏要引起重视,岑春煊借病乞休,实欲借窥朝廷意旨,目前派其弟在湘网罗亲信,不久就会发动^⑨，“京中闻亦颇有布置,若不趁此罢黜,复必难制,望密陈邸堂(奕劻),勿稍大意”^⑩。况且此年岑春煊入京即与赵启霖有

① 《张之洞致端方、岑春煊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2-000143-0081;《致江宁端制台、长沙岑抚台》(光绪三十三年六月廿二日),虞和平主编:《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抄本》第2辑第25册,第393页。

② 辜鸿铭与端方、张之洞均有交际,辜曾评价端、张性格及幕府品行,称“张文襄学问有余而聪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桥聪明有余而学问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门下幕僚多伪君子;午桥浮,故其门下幕僚多真小人”(参见辜鸿铭著,陈霞村校:《张文襄幕府纪闻》,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35页)。

③ 《张之洞致端方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2-000160-0115。

④ 《端方致张之洞、岑春煊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24-0122;《张之洞致端方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2-000160-0116。

⑤ 《岑春煊致端方电》(光绪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2-000143-0072。

⑥ 《岑春煊》,陈瀚一:《睨向斋秘录(附二种)》,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100~101页。

⑦ 《端方致袁世凯电》(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二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57-0062。按,该电文时间系根据内容及“支”电推断。

⑧ 赵启霖参劾庆王府的相关研究,参见刘鹏超:《奕劻贪污与晚清政局——以弹劾奕劻案为中心的考察》(博士学位论文),南开大学2014年,第79~105页。

⑨ 丁未政争去岑案,蔡乃煌自沪入京,联系恽毓鼎参劾岑氏,出力不少,被端方推荐给袁世凯,蔡得以充任邮传部左参议,成为端方在京眼线[参见《端方致袁世凯函》(时间不详),端方档案,档号:27-02-000-000124-0022]。

⑩ 《端方致蔡乃煌电》(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八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64-0007。

所联络,为时人所知,这就更坚定了端方的揣测^①。丁未政潮后的枢垣,各方互相制衡,据端方判断,“去小西林,邸必谓然,抱冰必反对”,“邸”为奕劻,“抱冰”为张之洞,军机处两公均有一定的话语权,排挤岑春蓂是有一定困难的^②。

蔡乃煌在京如何运作,并未见电文记载,只是十天后端方给蔡的电文称“贼(岑春蓂)事布置极妥,冰(张之洞)处函电当留意”^③,看来有所动作。端、蔡所采取的方式应是运动御史发难,这种手段于晚清政争中屡见不鲜,“当时台谏摧折大员,视为快事,一击不中,他御史便再接再厉,习成风气”^④。况且端方于此南北洋倾陷岑春焯时就运作过给事中陈庆桂、侍讲学士恽毓鼎,手段可谓驾轻就熟,此次选中了给事中李灼华,此人以敢言著称,曾奏陈岑春焯参劾人员不公,致使循良蒙冤,为岑氏兄弟的死对头^⑤。

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李灼华上折参岑春蓂,称其因父兄余荫,不学无术,信奉占卜,处理萍浏醴事不力,靡费官款,所用人员贪腐^⑥。经军机大臣奕劻、袁世凯运作,这封弹章廷寄给湖广总督赵尔巽,对岑的打击正式启动。同时蔡乃煌在京也有举措,对岑氏昆仲死党“逐渐剪其羽翼”,然后再探寻赵尔巽“于小贼意如何”^⑦。

赵尔巽与端方为官两湖多年,有金兰之谊,往来电函频仍,不乏敏感政事^⑧。端、赵二人针对此事确实有所沟通,“将贼弟兄险狡情形密为陈及,并属其(赵尔巽)力加防范,此事或不致轻放”,得出的结论是“天水(赵)于小贼(岑春蓂)本无感情”^⑨。看来经端方斡旋,赵尔巽同意联手对付岑氏昆仲。为与赵联合,蔡乃煌派遣亲信赵小鲁赴鄂布置,后忖度“贼事非面商无善法处置”,经与奕劻商量,得以“力保特简”为上海道,亲自到南京与端方面商^⑩。此中重要的关节在于蔡乃煌借此出京赴沪,搭乘京汉铁路列车途经汉口,顺路面见赵尔巽,将详情转达。出京前蔡向奕劻请了一道口谕,“传谕天水勿放松小贼”,得以“照准”^⑪,这样“密办小贼事”就有了更多的底气。这是一趟掩人耳目、一举多得的差使,鄂、京两地同时发动,谋划极为缜密。

京中奕劻起了决定作用,他与岑氏兄弟早生嫌隙,此前策划扳倒了岑春焯,此次有恐军机大臣张之洞回护岑春蓂,需要准备一些说辞。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三日,奕劻与张之洞被传见,两人有了当面交流的机会,据蔡氏密电称,“问小贼应去之故,历陈其阴险昏庸,询谁人能胜湘抚之任,举赵季和,相意大动,想难幸免”^⑫。看来奕劻向张之洞表明了去除岑春蓂的立场,推举赵尔巽之弟赵尔丰代替岑春蓂,显然是为了拉拢赵氏兄弟。奕劻应与张之洞达成了共识,具体说辞不详,“南皮已有意动小贼……大约内日必更人矣”^⑬。看来去岑时机成熟,已经到了讨论继任人选的地步。同时端方在两江依托管辖地之便,借助沪上报刊向外界散播因御史弹劾,两宫不满岑春蓂的言论,为去除异己制造舆论^⑭。

① 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4页。

② 《端方致蔡乃煌电》(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八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64-0007。

③ 《端方致蔡乃煌电》(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八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64-0015。

④ 何刚德著,张国宁点校:《春明梦录》,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69页。

⑤ 《给事中李灼华折》(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初三日),录副奏折,档号:03-7399-091。

⑥ 《给事中李灼华折》(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录副奏折,档号:03-5494-066。

⑦ 《蔡乃煌致端方电》(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2-000173-0009。

⑧ 赵尔巽曾任山西布政使,时任巡抚即岑春焯,未见二人交谊记述[参见《山西巡抚岑春焯折》(光绪二十八年六月二十一日),录副奏折,档号:03-5418-138]。

⑨ 《端方致蔡乃煌电》(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五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64-0049。

⑩ 《蔡乃煌致端方电》(光绪三十四年一月二十七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2-000173-0010。

⑪ 《蔡乃煌致端方电》(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一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2-000173-0011;《蔡乃煌致端方电》(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二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2-000173-0012。

⑫ 《蔡乃煌致端方电》(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三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2-000173-0013。

⑬ 《蔡乃煌致端方电》(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三日),端方档案,档号:27-03-000-000141-0350。按,此电未标注年月,通过电文中蔡乃煌自京发电,并准备赴上海道推测,应是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三月初蔡已经赴任上海道。

⑭ 《两宫不悦岑春蓂》,上海《大同报》第10卷第9期,1908年10月,第30页。

铲除岑春蓂关键环节在于赵尔巽针对御史弹劾的调查。二月二十二日,赵尔巽将给事中李灼华参劾岑春蓂的奏折做了回复,针对奏疏逐一核证,显然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得出的结论是“原参各节虽或事出有因,实多误会之词,均不得为该抚咎”,不过此举并不是替岑开脱。赵随后话风一转,以总督的身份罗列岑春蓂的种种不妥,参劾岑氏委以要任的湖南候补道沈祖燕、湖南第一军标统崔朝俊、湖南常备新军协统杨晋、湖南候补县丞杨瀚等人。总督比之于给事中参劾更具说服力,赵尔巽借助调查案情再次弹劾,明显是落井下石,去岑用意已经非常明确,折上朱批“著照所请该部知道”^①。在多方运作下,端方判断“小贼不日可除”^②。然结果事与愿违,这些平常的文科不足以撼动两宫,岑春蓂得以继续任湖南巡抚,为乃兄复出奔走。

三 波及“岑党要员”沈瑜庆

在打压岑春蓂的过程中还有一个插曲。江西巡抚瑞良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奏请开缺,称其父年逾七十,体弱多病,偶感风寒,病势加剧,所留遗缺由藩司沈瑜庆护理。军机处电允瑞良回京省亲,毋庸开缺^③。一省巡抚以家人病重为由辞官并不多见,名为尽孝,实内情复杂。瑞良请辞前将通省官员考核、人员调动做了新的安排,并就光绪三十二年以来困扰时日的江西教案上奏了结^④。迁延日久的江西教案让江督端方对赣抚瑞良早有不满,“赣案初起,鄙人(端方)首电外部,□先派兵相助。瑞鼎臣延不入告,遂被申斥,因此□隙不忘”,看来端、瑞在应对教案方面存有分歧^⑤。沈瑜庆与瑞良为赣省的藩司与巡抚,相处甚为投契,认为端方因赣案“欲推倒瑞鼎臣,为瑞莘如(瑞澂)谋赣抚”,遂有瑞良省亲之旨^⑥。有此过节,瑞良到京后陛见,狠狠的参了端方一本^⑦。

此时端方正与奕劻、袁世凯等人谋划去除岑春蓂,连带报复岑春煊。瑞良的面参引起心性敏感的端方疑忌,认为“此君在赣,事事假手,于人形同傀儡……鄙意此公碌碌,恐仍不免为人所使耳”^⑧。那么在端方看来,瑞良是受何人所使呢?几天后,端方得出结论,“为沈(瑜庆)所指使,沈为贼(岑春煊)死党,故必欲甘心鄙人”^⑨。显然端方将瑞良的反常举动归结于岑氏昆仲与沈瑜庆的怂恿。

端方的推断不无根据。沈瑜庆,字志雨,一字爱苍,号涛园,福建侯官人,沈葆楨第四子,光绪十一年顺天乡试中举,分刑部,寻改江南候补道,曾入张之洞、刘坤一幕,光绪三十一年,简山西按察使,未到任调广东,深得时任两广总督岑春煊信任,由臬司兼任学务处督办,一同督办学务的尚有藩司胡湘林,沈、胡“于办理学务事,诸多不合,而施行上不免生一番之阻力”,岑多听从沈建议,遇事与之商量,“胡藩势力遂因之大减”,由此不难看出岑、沈相知^⑩。沈、岑即使不是端方所言的“死党”,至少沈与岑氏尚可相处,为了彻底打倒岑家兄弟,沈瑜庆也不能放过^⑪。何况沈瑜庆对端方多有微词,称护理巡抚期间,江督端方以贻误为名,欲提贛藩及关粮库款,被其据例驳之。江西发生教案,江督欲移军剿

① 《湖广总督赵尔巽折》(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朱批奏折,档号:04-01-12-0661-009。

② 《端方致蔡乃煌电》(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四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64-0057。

③ 《为奏请开缺事收江西巡抚瑞良电》(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电报档,档号:2-04-12-033-1356;《奉旨瑞良著赏假一个月回京毋庸开缺事》(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电报档,档号:1-01-12-033-0226。

④ 《为遵办贛南教案议结事收江西巡抚瑞良电》(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电报档,档号:2-05-12-033-1404。

⑤ 《端方致某电》(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三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58-0007。按,此件为残件,并无电文开头,无收电人信息,结尾处亦未署名,笔者推断应是发给在京的蔡乃煌,因几日前即蔡氏密电告知瑞良面参端方,端方为此有所解释。

⑥ 《沈敬裕公年谱》,沈瑜庆:《涛园集》,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6辑第55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278页。沈瑜庆相关研究,参见戴海斌:《“两收海军余烬”:甲午、庚子时期沈瑜庆事迹钩沉》,《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4期,第77~86页。

⑦ 《蔡乃煌致端方电》(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六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2-000168-0054。

⑧ 《端方致蔡乃煌电》(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初七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64-0059。

⑨ 《端方致蔡乃煌电》(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一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64-0060。

⑩ 《沈泉兼学务处督办》,《岭东日报》,1905年6月13日,“本省新闻”;《学务处之前途》,《岭东日报》,1905年7月28日,“本省新闻”。

⑪ 陈三立:《沈敬裕公墓志铭》,沈瑜庆:《涛园集》,第360页。

办,上奏制止,“廷旨责成议结,遂无事”,还提及“按察使瑞澂欲提案在沪议结”,同样遭其驳斥,“于是比而喉言官中伤之”^①。沈家后人请陈三立撰写沈瑜庆墓志铭,亦记述此段史事,称江西按察使瑞澂与端方“中伤公,坐罢去”^②,成见之深自不待言。

在沈瑜庆看来,与端方交恶的原因还在于瑞澂,“督部(端方)初意为奇侯之孙(瑞澂祖父琦善为侯爵)谋贻抚,挤瑞(良)不遗余力,鄙人(沈)左袒瑞,谢绝其援贻之师(指江西教案,端方派兵事),乃大怒”^③。致使端方“喉广东言官某以蜚语中伤”^④,所找的这位“广东言官”就是曾弹劾岑春煊的陈庆桂。端方派专差进京,将拟好的奏章交给亲信蔡乃煌,运作台谏发动,并暗下决心,“神人共愤,天理难容,此事万不办到,鄙人一定引退矣”^⑤。

端方对此事具有把握的原因在于,给事中陈庆桂早就与他有所联络,上年两人就做局弹劾了岑春煊,这种索米弹章驾轻就熟,且对岑党抱有成见。陈庆桂很快据端方拟好的文料上奏,称沈瑜庆结党营私,劣迹昭著,任用私人,广招贿赂,弹劾内容多有细节,显然是熟知江西政情的端方提供文案。奏折特意提及“抚臣瑞良才本平庸,复耽安逸,于用人行政之事概置不问。故说者谓沈瑜庆之贪横至此,未始非瑞良之暗懦有以养之,江西民教积衅最深”,“酿成巨案”。对于办理江西教案的江督端方则多有赞誉,“幸而督臣端方派兵派员赴机迅疾,事得速了”,建议清廷“特派大员前往该省查办,抑或飭下两江总督臣端方就近据实确查,请旨办理”^⑥。

如陈庆桂所请,廷旨命两江总督端方查奏。端方逐一核实弹章细节,上报清廷,由于此案纯属子虚乌有,最终定案结果是“此次被参各节现均查无实据,应请无庸置议”,但也不无贬损之词,“求治之心太急,用人或未尽得宜,嫉忌者遂不免横生怨论”^⑦。由端方自导自演的弹劾闹剧告一段落,但端、沈的矛盾不可调和,端方无论如何不会让沈瑜庆在江西为官。

此年八月,冯汝骥调任江西巡抚,沈瑜庆回本任,二人龃龉。时人记述冯汝骥“腾洋务局藏娇”,沈瑜庆斥此行径“资外人之耻笑”,“荒淫溺职之罪,百喙莫辞”;冯则称“此予之特权,非藩司所能干预”^⑧,可见两人诟怨已深,江西官场沈氏处境愈发尴尬。更令沈瑜庆难以为继的是冯汝骥党于袁世凯,“新抚(冯)故党袁,袁又方柄国,卒倾公(沈)去位”^⑨。看来江西巡抚冯汝骥、两江总督端方、军机大臣袁世凯均与沈瑜庆或明或暗不睦是事实,势必不能容于赣。不久上谕下发,江西布政使沈瑜庆开缺,另候简用。沈终被排挤。沈瑜庆开缺后,端方致电惺惺作态,“公事突如其来,□中是如何原因,殊为诧异”^⑩。殊不知端方早将沈归入岑氏一党,暗中拨弄,除之而后快。

需要提及的是,端方原本找的枪手不是陈庆桂,“沈劣迹早已查明,特拟叶专差寄呈,十五晚间可到,请在家坚候。并祈即日密属南田(恽毓鼎)、太邱(陈璧)、青莲(李莲英)速进一椎,不惜费。此事所关至巨,无论如何总望即日办到”^⑪,看来端方早就策划好了打击沈瑜庆的方案。端方的本意是不惜本钱,联系恽毓鼎、陈璧、李莲英发难,却未见后续行动。不过就在陈庆桂上折前两日,恽毓鼎上奏称川汉铁路应特简大员总司其事,指出沪宁、津浦铁路皆派员督办,“川汉一路重于沪宁而难于津浦,似

① 《福建通志本传》,沈瑜庆:《涛园集》,第363~364页。

② 陈三立:《沈敬裕公墓志铭》,沈瑜庆:《涛园集》,第360页。

③ 《致高啸桐风岐书》,沈瑜庆:《涛园集》,第288页。

④ 《沈敬裕公年谱》,沈瑜庆:《涛园集》,第352页。

⑤ 《端方致某人电》(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三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58-0007。

⑥ 《给事中陈庆桂折》(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六日),录副奏折,档号:03-5499-073。

⑦ 《两江总督端方奏遵查藩司沈瑜庆被参各节据实复陈折》,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清末官报汇编》第68册,北京: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2006年版,第34149页。

⑧ 《沈瑜庆之挂冠》,陈瀚一:《睇向斋秘录(附二种)》,第55页。

⑨ 陈宝琛:《沈爱苍先生暨德配郑夫人六十双寿序》,沈瑜庆:《涛园集》,第355页。

⑩ 《端方致沈瑜庆电》(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初八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37-0065。

⑪ 《端方致蔡乃煌电》(光绪三十四年二月十一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64-0060。

亦应特简公正通达之大员总司其事,内与邮传部直接,外与两省所举总理协谋”。清廷将恠折发给邮传部审理,该部尚书陈璧具折逐一辩驳称,“川汉铁路毋庸另派督办”^①。笔者推测,瑞良或他人曾在京为岑春煊运动川汉铁路督办一职,即所谓“公正通达之大员”,端方先发制人,推动恠毓鼎与陈璧联合做局,致使岑氏谋划无疾而终,清末的政治生态于此可见一斑。

四 岑春煊谋求江督与赈务大臣

岑春煊在沪一日,端方即不得一日安宁,党同伐异,打击异己,清末报刊充当了重要媒介。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岑春煊在沪借《时报》发声,披露江督准备与横滨正金银行订立合同,借款一百万两,六厘利息,用金陵关作抵押,用以补官制改革亏空^②。端方告知熊希龄赈务需款万急,拟向华商借款暂济,绝无借洋债之事,亦并未有举此念头,请其转告报人狄楚青在《申报》声明借外款为谣传^③。

两江赈灾确有不得已之内情,光绪三十二年的江北大水为近代以来罕见的重大灾荒,外界对政府赈济多有责难。光绪三十三年冬,上海报界刊发报道称两江政府虚靡赈务巨款,江督因此被劾,实并无此事,属报纸传谣^④。但端方却认为这是岑春煊暗中散播谣传,“近闻贼人以巨贖运动台谏,将借赈务用款中伤鄙人”,看来端方对岑成见甚深,不得不大加防范,“贼谋险狠,又有善棍等出全力相助,不可不力为防范制之未然”^⑤。此前端方即推测岑借赈务发难的根本目的还在于谋求江督位置,“西林徘徊海上,久无佳兆,遂不能稍自忍耐,此等伎俩真不置一哂。近中如何运动,想公(梁鼎芬)亦已然屏烛之。鄙人在此筹办赈抚,改良敝政,不避怨谤,不皇寝食,自愧尚无成效,但愿此君善自为谋,钟山一席正可举以奉畀也”^⑥。“举以奉畀”自然是不可能,端方叮嘱主管沪上报刊的志锐刊文辨正,称“某大员因久无起用消息,特派员入都秘密运动,并拟借赈务用款及泉匪事,托言官某某设法中伤某督,为进用之地步”云云,此电并密送《新闻报》登录为要,同样借用报刊回击异己。同时将拟好的电文发给主管《上海泰晤士报》的亲信福开森,登文辩论,“闻有某大员派人挟资入都意欲运动言官,藉赈务用款太多,中伤某督,惟朝论均不谓然,某大员此举恐无效力”云云。请用大字登入北京专电”^⑦。“某大员”指的是岑春煊,“某督”为端方,显然这封电报是针对岑氏制造舆论的因应举措,还特意嘱托用“北京专电”,以免引起外界猜疑。

光绪末年各地水灾不断,除两江外,两广总督张人骏、安徽巡抚冯煦接连上奏灾情,请求赈济。见此情形,闲赋上海的岑春煊运动商界联合电请其出任粤、苏、皖、鄂、浙五省赈务大臣。此事被蔡乃煌探知,认为“非举盛(宣怀)不能过岑”,就是用盛宣怀代替岑春煊出任赈务大臣,并着手劝各商推举,建议端方速致电中枢,声明赈务由两江主导,否则即将五省赈务一事作罢^⑧。未见端方致电中枢诸公,应是蔡乃煌动用私人关系与奕劻联络,并很快得到回应,“枢廷嘱京友回电采呈,正宜努力,不可遽退,

① 《翰林院侍读学士恠毓鼎折》(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录副奏折,档号:03-7145-007;《邮传部尚书陈璧折》(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十八日),录副奏折,档号:03-7147-023。

② 《江督押借正金银行款项》,《时报》,1907年2月21日,第2版。

③ 《端方致志锐电》(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六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24-0023-1;《端方致熊希龄电》(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六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24-0023-2;《江督诘问借贷洋款事》,《申报》,1907年3月2日,第3版。

④ 《梁鼎芬致端方电》(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三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2-000169-0022。

⑤ 《端方致蔡乃煌电》(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廿三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64-0047。

⑥ 《端方致梁鼎芬电》(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65-0092。韩策认为岑春煊不能补江督之位,为其丁未年进京参劾北洋的重要动因(参见韩策:《清季江督之争与丁未政潮的一个新解释》,《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4期,第55~69页)。

⑦ 此份档案有两份电报草稿,分别是《端方致志锐电》(时间不详)、《端方致福开森电》(时间不详),端方档案,档号:27-02-000-000065-0010。

⑧ 《蔡乃煌致端方电》(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2-000193-0045。

邸(奕劻)已囑部稍松”^①。由此可见奕劻对打压岑氏颇为上心,令端方颇感欣慰,找到了同路人,倒岑信心更足,“枢电甚切,至有邸援颊,度支当可松动”^②。

端方听取了蔡乃煌推举盛宣怀代替岑春煊出任赈务大臣的建议,但对盛亦有成见,不忘叮嘱蔡“武进案盼速查复”,“武进”指的是盛宣怀。原来此间端方接到军机处字寄,审查盛宣怀侵吞国家财产案,上奏弹劾的给事中陈庆桂正是出于端方的暗中指使。陈庆桂上折一同劾弹的还有岑春煊,文料同是端方提供^③。可见端方与盛、岑冰炭日甚,不过为了阻挠岑复出,不惜举荐政敌,狡黠手段频出,根源还在于对宦途“热中太甚”“知进而不知退”。几年之后的保路运动,罢官归里的端方再与岑春煊争位,遭新军哗变,客死资州,令人唏嘘^④。

五 岑氏营造复出舆论与端方应对

端方任江督后,唯恐岑春煊与己互易,交怨益深,处处监视提防,暗中掣肘。端方幕僚龚锡龄直言,“今则西林开缺,锡龄始得安枕矣,然人心叵测,恐彼未遽甘心也”^⑤。蔡乃煌则言,“贼(岑)一日尚存,心必不死”,“贼日以报复为心,一有不确则必穷追”^⑥。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如何针对岑春煊,已经成为端府上下的共识。

端方的顾虑不是没有根据。光绪三十三年下半年,江浙绅民群起反对借用英国债款修筑苏杭甬铁路,渐起风潮。往来于上海与杭州两地的岑春煊借机鼓动,对政务多有微词,“西林在杭于苏杭甬路事暗中力为煽动”,端方判断此举实为复出铺垫,“月初间复潜来沪上,与其党秘结英人,谋去粤督,以求复职”,并探查到沪上报界受岑指使,“屡登西林被召将接粤督,确系伊之授意”,进一步推测岑春煊“暗属报馆日言政府外交失败,希图推翻,本意在藉此推翻政府”,看来岑的野心不止于复出,还有复仇的成分^⑦。

更让端方不能容忍的是,各报屡登岑被召,制造舆论。自岑罢免后,沪上发行量较大的《申报》每隔一段时间即有岑复出的传闻,或补两广或接替江督,这时常刺激着端方敏感的神经。光绪三十三年七月十九日,岑春煊罢官仅半月,《申报》即刊登消息称岑要替代入京的张之洞接任湖广总督^⑧。半个月后,该报又称袁世凯力保岑为两江总督,并称军机大臣奕劻极为赞成^⑨。奕劻、袁世凯与岑春煊诉怨甚深,自然不会力保推荐,此显然为假消息,不过却最有市场,民众尤为青睐,被报界连续转载,“政府将再任岑云帅督办两广军务,已见各报”,“某大军机在慈宫前力保,拟俟岑帅到京后,决以繁要之总督简放”^⑩等。总之,有关岑的去向已经成为时论焦点。

报纸为博人眼球刊发达官的风闻,本是办报的常见操作,不足为奇。但在端方看来,谣言本身不可信,但背后代表了朝野的心理,唯恐这些荒诞的谣传制造出合理的舆论环境,自然不能麻痹大意。为此,端方专电询问蔡乃煌,“报载西林内召及复请代奏电文甚详,是否确有其事?南皮(张之洞)欲援以抵项城(袁世凯),其事甚奇,确否?”^⑪端方担心“政地诸公必有为彼所摇惑者,图之不早,恐一出而

① 《蔡乃煌致端方电》(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2-000193-0035。

② 《端方致蔡乃煌电》(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58-0010。

③ 参见张建斌:《端方与“丁未政潮”》,《近代史研究》2021年第3期,第92~106页。

④ 何刚德:《春明梦录》,第36页。按,相关研究阐释了端方与岑春煊、赵尔丰际[参见尹传刚:《端方与四川保路运动》(硕士学位论文),暨南大学2012年,第75~105页]。

⑤ 《龚锡龄致端方函》(时间不详),端方档案,档号:27-02-000-000202-0018。

⑥ 《蔡乃煌致端方电》(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三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58-0010;《蔡乃煌致端方电》(时间不详),端方档案,档号:27-03-000-000012-0011。

⑦ 《端方致蔡乃煌电》(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八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64-0007。

⑧ 《岑云帅又有改简两湖之望》,《申报》,1907年8月27日,第3版。

⑨ 《专电三》,《申报》,1907年9月15日,第3版。

⑩ 《岑云帅起用传闻异辞》,《广益丛报》第165号,1908年4月,“纪闻”,第2页。

⑪ 《端方致蔡乃煌电》(光绪三十三年十月十五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1-000164-0014。

不可复制”^①。未见蔡回复,端方的隐忧与顾虑是显而易见的。几日后,端方又致电湖北按察使梁鼎芬,称“报馆天下选新闻,诡称此京专电,大都无据者多,鄙人之被参与西林之被召皆此类也”,看来已经判断岑入京并无确据,多少有些聊以自慰的意味。不过沪上报界依然关注岑的举动,不时刊发京内外相关各类新闻,为政敌“制造舆论”是端方绝对不能容忍的,于是整饬沪上报界提上日程^②。

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一日,《申报》又刊文称岑春煊将要复出,“两宫拟起用前粤督岑春煊制军为某督之后任”^③。这类官员任免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冠以京中密函的噱头,实则大都是捕风捉影的小道消息。但这则寻常新闻却引起了端方警觉,同日《中外日报》《神州日报》刊发岑将任命为禁烟大臣的报道,“有调京派禁烟大臣之意”^④，“闻张鹿两军机力保充禁烟大臣”^⑤。沪上报纸同步发文,为岑复出制造舆论,显然内情并不简单。端方嘱咐刚上任上海道的蔡乃煌调查更正,称“廿日《申报》言贼(岑春煊)将外用,《中外》《神州》则言其将为禁烟大臣。此等谰言,必皆系贼所运动”,“属其立为更正”。况且《中外日报》等沪上报纸政府已注资不少,反倒被岑利用,“断不能听其任意造谣,为贼机关”^⑥。

端方很快出台反制措施,同样是炮制新闻,将岑春煊与贻谷案联系起来。此年绥远城将军贻谷因占地侵款被参劾,涉案数额巨大,贻谷担任蒙旗垦务大臣,正是出于时任山西巡抚岑春煊所上《筹议开垦蒙地折》,两人针对蒙旗开垦边务多有交流。端方于是借此倾陷^⑦,称:“某大员系侵吞巨款某将军之死党。该大员自罢斥后,日日运动起用,迄无效果,现已技穷力竭,甚形狼狈。惟不时尚遣其党秘密到京,设法营谋,故时有此等风说传出。查某将军之得管边务,系由该大员力荐,两人交际最为秘密。今某将军事已败露,恐该大员亦未能幸免也’云云。”^⑧为免追责,未明确点名,“某大员”指的是岑春煊,“某将军”为贻谷,但指向不言自明。在此,清末报纸充当了政争的工具。

不仅如此,端方又嘱人散布岑春煊病重的消息,在选取刊文报纸方面也是颇费心思、格外小心,唯恐各报受人运动,泄露计划,最终在蔡乃煌的建议下选择了《新闻报》^⑨。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五日,《新闻报》刊载岑春煊病重的消息一则,“病体迄今未愈,仍拟赴沪就医”^⑩。此间发行量较大的《申报》也刊登了两宫垂询岑氏病情的新闻^⑪。两则谣言暗含隐喻:岑春煊身体抱恙,不能胜任禁烟大臣,以此遏制岑复出的舆论。

揆诸史实,岑春煊勇于任事,时望甚隆。时人谈光绪末叶督抚优劣,谓岑春煊“果敢有风骨,第一等也”;相比之下,张之洞与袁世凯“均负盛名,然张皇欺饰,宜考最下”^⑫,不惜深贬张、袁,推重岑春煊,不难看出后者确实在晚清督抚中具有一席之地。岑春煊再次被启用已是宣统朝端方、袁世凯遭罢职,朝中政敌式微之际,否则还难有进用机会。岑在罢职后与保皇会、革命党若即若离,与其仕途不顺有莫大的关联,也促成了护国运动中与各方联合反袁,并在就职两广护国军都司令时称:“袁世凯生,我必死;袁世凯死,我则生耳!”^⑬长期积累的芥蒂之深于此可见,清末统治阶层内部的矛盾对于民初的政局产生深远影响。

① 《端方致蔡乃煌函》(时间不详),端方档案,档号:27-02-000-000124-0024。

② 关于两江政府整饬报界问题,参见张建斌:《端方与上海报界研究》,《学术月刊》2023年第3期,第197~209页。

③ 《京师近事》,《申报》,1908年10月15日,第2张第2版。

④ 《专电》,《中外日报》,1908年10月15日,第1张第1版。

⑤ 《本馆专电》,《神州日报》,1908年10月15日,第1页。

⑥⑧ 《端方致蔡乃煌电》(光绪三十三年九月二十三日),端方档案,档号:27-03-000-000140-0291。

⑦ 光绪三十三年贻谷被归化城副都统文哲珩参劾,身陷囹圄。1921年,岑春煊上书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为贻谷翻案平反。

⑨ 《蔡乃煌致端方电报》(光绪三十四年九月二十四日),端方档案,档号:27-01-002-000192-0137。

⑩ 《慈宫垂询岑官保》,上海《新闻报》,1908年10月19日,第2版。

⑪ 《专电三》,《申报》,1908年10月17日,第4版。

⑫⑬ 徐一士:《一士谭荟》,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225页。

清末十年清廷统治陷入多重危机并存的困局之中,立宪思潮激化与各地革命爆发,政治认同出现严重分裂,雪上加霜的是统治阶层政治生态失衡、从政环境恶化,政府的合法性权威受到了极大挑战。岑春煊谋求复出的政治运作仅是政局中的个案,却无疑昭示着统治集团公信力与凝聚力缺失的整体面相。官员“各自挟其目的而进,即各自就其功业而去”^①。时人恽毓鼎感叹:“今日时势,无论大官小官无一得行其志者,可胜浩叹。”^②伴随着新政中社会各阶层政治参与的扩大,外部各种社会群体诉求膨胀,体制内精英之间的倾轧、政见分离给清廷施加更多压力,导致了更为严重的社会动荡与政治冲突。

收稿日期 2022-09-14

作者张建斌,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100101。

The Aftermath of Dingwei Political Conflict: Centering on Cen Chunxuan Seeking a Comeback and the Response of all Parties

Zhang Jianbin

Abstract: The powerful minister Cen Chunxuan was excluded from the center of political stage during the Dingwei political conflict in the 33rd year of Emperor Guangxu's reign. Afterwards, he actively sought for a more powerful position for himself and was secretly obstructed by various forces in the court. This could be seen as the aftermath of the political conflict. Cen Chunming, the Governor of Hunan, proposing to select honest and upright officials to patrol the Yangtze River, was actually voicing out for his brother Cen Chunxuan's interference with the water affairs alongside the Yangtze River. The action of Cen Chunming had aroused the dissatisfaction of Duan Fang and Zhang Zhidong, who were then the governors of China's southern provinces. Cen Chunming's proposal was rejected and he was secretly impeached. The joint suppression of Nanyang and Beiyang camps spread so widely that the key member of the Cen party Shen Yuqing was also affected, turning the imperial censors into a means to initiate conflicts. Duan Fang, the Governor of Liangjiang aimed at Cen because the latter casted greedy eyes on his administrative position. Thus, Duanfang paid special attention to his opponents entrenched in Shanghai, showed an intolerant attitude towards the various schemes and consensus created surrounding Cen's comeback. This was clearly revealed in the contents of late Qing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whose intervention with politics was very deep during this period. The process of Cen's seeking a comeback reflects the evolution of power structure and the change of political ecology during the time of Guangxu and Xuantong's reigns.

Keywords: Cen Chunxuan; Duanfang; Yuan Shikai; Zhang Zhidong; Dingwei Political Conflict

【责任编辑 张秀丽】

① 《论瞿鸿禨之革职》,《申报》,1907年6月19日,第2版。

② 史晓风整理:《恽毓鼎澄斋日记》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88页。